



南开大学
Nankai University

“掏鸟窝案”的法理分析 ——以环境法为视角

姓名：郭子昂

班级：法律硕士（法学）

学号：2120191973

课程：环境资源法专题

教师：刘芳

2020年2月

“掏鸟窝案”的法理分析——以环境法为视角

郭子昂 / 法律硕士（法学） / 2120191973

一、“掏鸟窝案”案情回顾

“掏鸟窝案”是 2016 年春节前后引发媒体广泛讨论的一件生态环境领域案件，以下是辉县市人民法院一审刑事判决书中的事实认定部分：

经审理查明：

（一）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

1、2014 年 7 月 14 日左右的一天，被告人闫啸天、王亚军在辉县市高庄乡土楼村一树林内非法猎捕燕隼 12 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后逃跑一只，死亡一只。2014 年 7 月 18 日，被告人闫啸天、王亚军卖到郑州市 7 只，以 150 元的价格卖给被告人负某燕隼 1 只。被告人闫啸天独自卖到洛阳市 2 只。

2、2014 年 7 月 27 日，被告人闫啸天和王亚军在辉县市高庄乡土楼村一树林内非法猎捕燕隼 2 只及隼形目隼科动物 2 只，共计 4 只。

（二）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

1、2014 年 7 月 18 日，被告人负某在辉县市百泉镇李时珍像处以 150 元的价格收购了被告人闫啸天和王亚军于 2014 年 7 月 14 日左右猎捕的燕隼 1 只；2014 年 7 月 30 日，辉县市森林公安局在被告人负某家将该只隼扣押。

2、2014 年 7 月 26 日，被告人闫啸天从河南省平顶山市张某手中以自己 QQ 网名“兔子”的名义收购凤头鹰 1 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2014 年 7 月 28 日，辉县市森林公安局在被告人闫啸天家中查扣同月 27 日被告人闫啸天和王亚军猎捕的隼 4 只和被告人闫啸天同月 26 日收购张某的凤头鹰 1 只。

二、“掏鸟窝案”的法理分析

本案在法理上有两个关键点值得分析：第一，舆情与法理的关系是什么？第二，本案中的行为侵害的法益是什么？

司法案件的报道已经成了当今备受关注的舆论内容。本案在最初报道中描绘的故事里，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在校大学生，一时贪玩，掏了家门口的一窝小鸟，转卖获利一千多元，但却被判十年半有期徒刑。巨大的反差导致了强烈的质疑和讽刺。但随着跟踪报道、各方评论和判决书的公布，真相浮出水面：案件当事人并非是不知世事的大学生，而是一个长期混迹“玩鸟界”，配备了专业猎鸟工具的资深玩家。被掏的也不是普通的小鸟，而是受国际公约保护的珍惜鸟类。于是舆情迅速从质疑法院转向了质疑最初歪曲报道的媒体和刻意混淆视听的人们。

舆情与法理，向来是一对关系纠结复杂范畴。尤其是进入新媒体时代后，大量案件不仅在法庭上审理，也要在舆论上接受公众的审视。有时候舆情能推动案件更好地落实法理，有时候舆情却是对法理的悖离。在这一对纠结的关系中，不论是携舆情以令法理，还是携法理以压舆情，都没办法克服两者之间的复杂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舆情和法理都不是一次性的事件。我们不能说一次具体的报道就构成了舆情的整体面貌，也不能说一个判决就构成了法理的周全考虑。但争议却往往是由具体的报道和特定的个案所引起的。因此要看清两者的关系，必须结合个体层面和整体面貌来看，不能以个例否定整体，也不能以全景遮蔽细节。

第二，本案中的行为侵害的实质客体是生态法益。生态法益是依据宪法或一般人权法准则确立的人在生态环境领域所享有的包括呼吸清洁空气、饮用清洁水源，在安宁、洁净的环境中生活，并可合理享有与利用自然环境或自然资源的权利或利益。传统刑法理论认为，“掏鸟窝案”等环境资源案件侵害的客体是环境资源管理制度。解释具有相当的历史局限性，已经落后于当前世界范围内包括我国的生态文明理念了。所有的制度构建都是为了促进以人为中心的利益识别与保障，

将环境资源管理制度解释为实质保护客体，忽略了人在价值上的主体性与终极性。^①

三、“掏鸟窝案”的环境法启示

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美国历史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环境法判例，为了一种濒危的三英寸的小鱼，要停止已投入近 1 亿美元将要完成的大坝，即小鱼大坝案。1973 年，鱼类学家发现一种三英寸长小鱼，数量在 1 万至 1.5 万之间，只能生存在干净砂砾底层，以食蜗牛为生，故名为蜗牛镖。后美国国会通过《濒危物种法》，将蜗牛镖列入濒危物种。但在法律通过之前，小鱼的关键栖息地已修建大坝，国会投入 1 亿美元，工程完成 80%。大坝一旦建成，小鱼面临灭绝的风险，遂引发一场诉讼。争议点是大坝建设在先且接近完工，《濒危物种法》在后，不应当用后设立的法律来规制之前的行为。后经过三级法院审理，最终联邦最高法院为保护小鱼维持上诉法院判决赋予法律溯及既往的效力，判决永久性禁止大坝工程完工，直到国会立法免除大坝遵守《濒危物种法》的义务，或者蜗牛镖从濒危名单中删除，亦或有重新栖息地。

这个案件影响深远，小鱼代表了一大群濒危物种，当生态价值与明显可见的另一种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受到社会强有力的挑战。它所引领的价值，就是尽一切努力，避免野生动物资源的进一步减少，这是高于一切的需要，亦是人类对自然的敬畏。尤其是随着工业化的进程，野生动物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过去两千年中有资可查的哺乳动物灭绝的数量有一半发生在近 50 年时，我们的态度应更加明朗。

诸如“掏鸟窝案”看似小的案件也会对公共利益有所侵犯，只是这种侵犯的危害性周期更长、隐蔽性更强，更需要在审判中考虑不同价值观的权衡。这就要求

^① 焦艳鹏.生态文明保障的刑法机制[J].中国社会科学,2017(11):75-98+205-206.

各地法院逐步引入环境资源保护法庭；侦查人员及审判人员转变审判理念，加大对危害性的审查，在庭审中出示相关危害性的证据，在判决中加强文书说理，充分发挥判决的指引作用，或者通过巡回审判、专家论证、法官后语等方式宣传理念、引领价值，以期“小案”能够产生“大影响”的蝴蝶效应。